

---

---

# 金代士大夫的古物鉴藏实践、书写与文脉意识<sup>\*</sup>

——以元好问为中心

杨万里

**内容提要** 金代士大夫鉴藏古物的风气十分盛行，他们以藏物之富和鉴裁之精相标榜，颇有追慕中原风雅之意。元好问不仅是金代热衷于鉴藏古物的典型人物，还围绕古物进行了丰富的文学书写，咏赞了金源一代文物之美，有时也寄托着流落之情与故国之思。他秉持儒家“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的待物之道，主张在古物鉴藏中增智修德，以扩充君子之学和赓续文脉。金代士大夫古物鉴藏的特征和意义在于：金源全盛之日的古物鉴藏体现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志乎稽古礼文的态度，促使中华文脉在北方得以绵延生长；金元易代之际元好问等人的鉴藏实践和文学书写中带有文化感伤的浓重色彩和护佑文脉的使命意识，为其后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元好问 金代 古物鉴藏 文脉意识

自先秦以来的士大夫群体一直保持着博雅好古的思想传统，并直接促成了他们乐于鉴藏和题咏古旧之物的性情与习惯。这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受到王国维等学者的广泛关注。因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金代士大夫也有着慕恋古物的普遍心理，形成了崇尚古物鉴藏与题咏的一代风气，其中“一代宗工”元好问最具典范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元好问的研究“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的研究态势”<sup>①</sup>，但对其古物鉴藏实践及相关文学书写进行专题探讨的成果并不多见，仅是在一些论著中偶有涉及而已<sup>②</sup>。其实元好问本人不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鉴藏家，而且其文学创作大量涉及金石、书画、古籍、古镜、古砚等古物秘玩，体现着金代古物鉴藏的时代风气和主要特征，也蕴藏着金元易代之际传承和重建中华文脉的责任心理。通过梳理元好问著作中与古物鉴藏有关的文献资料，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呈现其学问性情和精神世界。在此基础上结合金代其他文史资料，可以深刻解读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士大夫古物鉴藏活动背后的情感心理和文脉意识，丰富我们对金源文学特征与文化地位的认知。

---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明理学家‘游艺’之学与文艺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7CZW021）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狄宝心《20世纪以来的元好问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sup>②</sup> 如段莹《金元鉴藏风气转移中的东平士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12期）、张文澍《元好问在乱世中的翰墨文玩之情》（《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饭山知保《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邹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2页）等，均提到元好问鉴藏古物的现象，但是缺乏深入系统的论述。学界对金代鉴藏活动整体关注较少，这从周文翰《中国艺术收藏史》（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设专章论述隋唐对“古物”的迷恋和宋元文化收藏的兴盛而忽略金代就可略窥一斑。

## 一 从文士慕恋古物的传统到金人雅好古物之风

士大夫群体慕恋古物的传统由来已久，尤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博雅好古成为君子人格的显著标识。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孔子对三代典籍的整理与复兴古人礼乐的努力为后人树立了好古的典范。孔子又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圣贤养成路径，深刻影响着后代儒士的学术追求与价值观念。朱熹阐释“游于艺”的内涵：“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sup>①</sup>将玩物游艺之学视为修养身心以成德入圣的重要途径，直接影响了文人群体好古博物的精神传统。中唐文人对古物的喜爱程度相比之前增进了许多，主要表现为对与珍贵古物关系密切的生活旧物有浓厚眷恋之情，并有意识地在各体文学中进行淋漓尽致书写。“对旧物的眷恋在文本中的大量表现”，彰显出“一种‘感伤文化’在逐渐形成”，虽然“中唐的这种感伤文化却不能和北宋的好古和收藏的精神等同起来，也不同于有宋一代对各种物类编撰记传和谱录的热衷”，但应该说已经“预兆了北宋时期对古董的热衷”<sup>②</sup>。

魏晋至隋唐虽多有获古鼎器的文献记载，“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世所公认的慕恋古物风气最盛的时期当数两宋，蔡绦就曾感慨士大夫阶层博雅好古之风“独国朝来浸乃珍重”<sup>③</sup>。当时上至帝王贵胄，下至底层文士，均对青铜器物、古镜瓦砚、古籍字画等表现出强烈的鉴藏与探究热情。有学者指出，宋人慕古的风气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举世的收藏热潮、学术研究盛行、艺术表现丰富和诗歌书写频繁<sup>④</sup>。刘敞《先秦古器记》、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等著作，均是宋代士大夫雅好古物风气的集中体现。宋代帝王中喜好古物者亦不少见，甚而在战争时犹且不废搜集古物的兴致。《齐东野语》载：“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盖睿好之笃，不惮劳费，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sup>⑤</sup>帝王于古物之态度尚且如此，文人之好古可以想见，而且两者之间往往形成上下交通的互动关系，从而构成了风靡一代的好古之风。

相对于北方民族政权而言，以王道和文脉正统自居的宋代政权不仅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也在与其他政权的频繁交往中扮演着礼乐文明输出者的角色，并扩大着中原文化的辐射效应。宋与辽金之间长期保持的交聘制度和榷场贸易等，均有效促进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其中也包括一些具有收藏价值的文化产物在内。不过，宋朝文物流入金人之手的主要原因还是战争，每一次重大战事及“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收藏的重新洗牌”<sup>⑥</sup>。靖康之乱后，不仅宋廷内府所藏被洗劫一空，民间的私人藏品也难逃厄运。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即详细记录了赵明诚多年所集金石书画在战争中遗落殆尽的过程，成为这次浩劫的一个缩影<sup>⑦</sup>。面对金兵压境，宋廷往往采取割地赔金的方式来换取短暂的和平，而当朝廷府库难以支撑时，不仅会拿内府所藏珠宝器物去充抵，也会聚敛民间的珍贵物品。如《大金吊伐录》所收《宋主为分画疆界书》中载：“金银再取于民间，根刷详尽，委无隐漏。所得之数，不能敷

① 朱熹《论语集注》卷四，《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页。

② 田晓菲《中唐时期老旧之物的文化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③ 蔡绦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页。

④ 参见邓沁露《古物：宋代的诗歌与审美心态》，《安徽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⑤ 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页。

⑥ 曹蓉《〈云烟过眼录〉中的鉴藏活动——元初的古物交易与流转》，《艺术工作》2018年第5期。

⑦ 参见李清照著，黄墨谷辑校《重辑李清照集》卷六，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3—128页。

足，遂以历世宝藏珠玉犀象珍器等悉数持送。本朝所贵，不敢爱重；因物显意，可谅此诚。”<sup>①</sup>此番搜刮可谓穷尽宋朝上下长期积累之金银宝玩，以致出现了“自此朝廷宴设，止有丹漆之器，而市肆饮酌，皆埏埴之资”<sup>②</sup>的窘迫局面。再如元好问《续夷坚志》记述了米芾《华陀帖》在靖康之乱中的流转情况，此帖“神迹超轶，辉映今古；汴京破，失所在”，后来流落民间，“历三四传”，最终落入好法书名画的完颜永功之手，越王薨后遂被其子完颜璫所藏，相与往来的文士才有机会见此名帖<sup>③</sup>。可见，受战争影响，宋朝长期以来积攒的珍贵文物在短时间内集中流入了金人之手，因此出现了后来《齐东野语》所提及的南宋之人“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的倒置现象。

随着宋朝文物大量涌入金廷以及一些文人儒士的北上，鉴藏古物的风气也被顺势带入了金源士人群体中，出现了金源盛日朝野上下鉴藏业繁荣一时的局面。这首先得益于金代帝王对中原文化的崇尚，赵翼《廿二史札记》在列举金代帝王雅好文艺的诸多现象后指出：“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sup>④</sup>如海陵王完颜亮即“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sup>⑤</sup>。尤其是受过良好汉文化教育的金章宗在位期间，不仅积极摹仿汉族帝王礼制，钦慕汉族文士风雅，而且致力于充实内府收藏，所收法书名画甚至堪与北宋宣和御府媲美，“在章宗的带动下，金朝贵胄、士夫的鉴藏也尤为踊跃”（《金元鉴藏风气转移中的东平士人》）。

刘祁《归潜志》对金国文士爱好收藏古物的现象多有记录。如卷一描述其造访密国公宅第时，但见“一室萧然，琴书满案”，完颜璫“乃出其所藏书画数十轴，皆世间罕见者”<sup>⑥</sup>。完颜璫工书善画，故其所藏以古人字画为多，这与元好问《题樗轩九歌遗音大字后》所云正相印证：“公家所藏名画，当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与展玩，品第高下，至于笔虚笔实、前人不言之秘，皆纤悉道之。故时人推画中有鉴裁者，唯公与庞都运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sup>⑦</sup>《归潜志》卷一又谓金代诗人雷渊“好收古人书画、碑刻藏于家，甚富”（《归潜志》卷一，第10页）。雷渊曾做过翰林修撰，学问广博，收藏亦丰。卷三称曹恒“又好收古人书画、器物，蔼然有士君子风”（《归潜志》卷三，第29页）。卷四谓张毅为“君子儒”，其弟毅“独好收古人器物，所在购求，以是丛于家，古镜尤多，其样制不可遍识。字画劲古，有颜平原风”（《归潜志》卷四，第35页）。可见金代士大夫收藏品类之富和赏鉴兴致之高，这些直接带动了民间收藏热潮：“平时富贵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发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将以充其室，夸耀于人以自乐者皆是也。”（《归潜志》卷一二，第138页）“有士君子风”“有颜平原风”云云，似有直追唐宋人物风流且独开一脉之势。

金代士大夫古物鉴藏与文学书写的时代热情在《中州集》中也有充分呈现。一是其中所收诗歌有许多集中吟咏古物之作，如宇文虚中《古剑行》、麻九畴《赋伯玉透光镜》、李夷《古剑》等，题咏古人字画者尤多；有些诗则直接反映了古物盛行的社会风气，如刘长言的《通叔以诗送古镜为长言生日之寿次韵谢之》即反映出金代士大夫之间以赠送古物作为贺寿之礼的交往习俗，段克己《古瓶梅花为总管李侯赋》，赵秉文《古瓶腊梅》“石冷铜腥苦未清，瓦壶温水照轻明。土花晕碧龙纹涩，烛泪痕疏

① 佚名编，金少英校补，李庆善整理《大金吊伐录校补》，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78页。

② 《遣李榭持宝货物折充金银书》，《大金吊伐录校补》，第173页。

③ 参见元好问《续夷坚志》卷四“华陀帖”，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卷五一，三晋出版社2015年版，第3册，第1037页。

④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二八“金代文物远胜辽元”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册，第623页。

⑤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一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187页。

⑥ 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⑦ 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中华书局2012年版，上册，第106页。

雁字横”<sup>①</sup>，党怀英《西湖晚菊》“古瓶贮清泚，芳樽湔尘霏”<sup>②</sup>等诗句，皆反映出金代士大夫以古瓶插花、以古学为尚的日常喜好。二是《中州集》的一些文人小传直接记录了金代文士热爱古物的博雅性情，也流露出元好问对好古品格的推崇之意。乙集称赞任询“家所藏法书名画数百轴，日夕展玩，不知老之将至”<sup>③</sup>；戊集谓刘祖谦“家多藏书，金石遗文略备。父东轩，工画山水，故光甫以鉴裁自名”<sup>④</sup>；辛集张穀小传中称其“家多法书、名画、古物、秘玩，周秦以来镜至百余枚，他物称是”<sup>⑤</sup>，颇有博雅君子之风。元好问将金人的古物题咏之作收入《中州集》或是无意，但在诗人小传中重点标榜这些收藏宏富的文化伟绩，不可谓无心，毕竟如果没有这些“足备金源一代故实”的小传，金源一代文物之美很可能就“湮灭而无闻”了。

元好问《续夷坚志》中也有关于金人崇尚蓄藏古物的丰富记载，而且与《归潜志》寥寥几笔的叙述相比，显得更为详尽。如：“东平人钱信中，按《钱谱》收古钱，凡得数十种，付之茶店刘六。刘本漕司胥吏家，素称好事。及多收古钱，聚两家所有，以锦囊贮之。……此家所畜，不特古钱，书、画、琴暨古物，无不略具。士大夫日聚于此，杂客不豫也。东平破后，不知古物在否也。”<sup>⑥</sup>记录了东平人钱信中、茶店刘六等收藏古钱币及其他古物的嗜好，其所收古钱样式多有世所罕见者，如尤为厚重的“金错刀”、众钱之冠“方寸匕”、燕尾形的“王莽大钱”等，吸引着诸多士大夫聚谈于此，颇有承平气象。结尾一句将元好问对战乱中古物命运的惋惜之情展露无遗。又如载蔡珪的见闻：“大定七年秋，与萧彦昭俱官都下。萧一日见过，出古镜相示曰：‘顷岁得之关中。虽爱之甚，然背文四字不尽识，且不知为何时物。’予取视之，汉物也。文曰‘长宜子孙’。《宣和博古图》有焉。出图示之，殆若合符。彦昭惊喜。有姚仲瞻在坐，言曰：‘仆家一镜，制作亦奇。宋末得于长安土人家。相传为太真奁中物，不之信也。’”<sup>⑦</sup>后取张芸叟《冗长录》使读之，果证其为玄宗迁幸时贵妃所遗之物，即此可见金代士人的崇古猎异之风与博闻强记之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面一段：“秀岩安常字顺之，常从党承旨学大篆，多识古文奇字。泰和末，尝见内府所藏汤盘，作白玉方斗，近四小寸，底铭九字，即‘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也。章宗有旨令辨之。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饕餮象在雷文中。铭云：‘鲁公作文王尊彝。’铜既古，莹如碧玉，无复铜性矣。”<sup>⑧</sup>此处已非鉴藏青铜器物的一般兴致，汤盘周鼎均为上古圣王之物，被视为国家宝器和正统象征，所以金章宗才会倍加重视。如此看来，金人对古物鉴藏的热情并非皆出于夸耀自乐之俗心，也颇多赓续文脉、树立正统的隐含用意。

以上足可说明，金代朝野慕恋和鉴藏古物的风气非常盛行。士人群体不仅以藏品之富和鉴裁之精相标榜，而且热衷于古物著述和文学书写，颇有追慕中原风雅以至在北方树立文化正脉之意，为我们深入理解其学问性情和文化心态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 二 元好问古物鉴藏实践及其相关书写中的文化感伤

元好问是金代士大夫中各方面成就都比较突出的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受时代风气和家学渊源的影响，他怀有极大的古物鉴藏热情，并在诗文创作中着意书写古物之美与鉴

①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丙集第三，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册，第829页。

② 《中州集校注》丙集第三，第2册，第689页。

③ 《中州集校注》乙集第二，第2册，第427页。

④ 《中州集校注》戊集第五，第4册，第1339页。

⑤ 《中州集校注》辛集第八，第7册，第2157页。

⑥ 《续夷坚志》卷三“古钱”条，《元好问全集》卷五〇，第3册，第1014页。

⑦ 《续夷坚志》卷三“镜辨”条，《元好问全集》卷五〇，第3册，第999页。

⑧ 《续夷坚志》卷二“汤盘周鼎”条，《元好问全集》卷四九，第3册，第977页。

藏实践，成为崇尚集古的典型人物。

元好问的祖父元滋善、生父元德明、嗣父元格，皆有收藏古旧器物和古籍字画的爱好的，由此形成了博雅好古的家风。元好问长兄以“好古”为名，足见元氏家族之志意。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到元好问时，家中所藏珍品已非常丰富。元好问专门撰写《故物谱》一文，自豪地细数家中藏品：

予家所藏，书，宋元祐以前物也；法书，则唐人笔迹及五代写本为多；画，有李、范、许、郭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鹤》最为超绝，先大父铜山府君官汲县时，官卖宣和内府物也。铜碌两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时物也。“风”字大砚，先东岩君教授乡里时物也。铜雀砚，背有大钱一，天禄一，坚重致密，与石无异，先陇城府君官冀州时物也。（《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392页）

所藏书籍多为元祐以前的珍贵旧抄本，彼时刻本尚未大量流行。这些古书是元氏几代人多方求购所得，《故物谱》后文提到：“往在乡里，常侍诸父及两兄燕谈。每及家所有书，则必枚举而问之。如曰某书买于某处，所传之何人，藏之者几何年，则欣然志之。今虽散亡，其缀缉装褙、签题印识，犹梦寐见之。”<sup>①</sup> 诸父兄对这些来之不易的古籍精心珍藏，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堪称佳话，可见遗山博雅好古性情之渊源。这些书在战争中的散亡，意味着文化遭到破坏，其痛心疾首之情只能付诸一“梦”。元氏所藏字画亦非常人所及，书帖多唐真迹和五代写本，图画则有李成、范宽、许道宁、郭熙等大家手笔，其中尤以元滋善在汲县所购宣和内府藏薛稷《六鹤》最为遗山叹赏。此外还有三方古砚，即铜碌两小山、“风”字形大砚和铜雀台瓦砚，遗山对其来源、形状、材质等都能一一道出，足见其赏爱之心。贞祐四年（1216）蒙古军围攻太原时，这些故物皆赖藏于壁间而侥幸得存。后来他要到三乡避难，故决定将大部分藏物托付给太原亲友，其余尤为爱惜的书籍“尚千余册”，“并画百轴，载二鹿车自随”，“三砚则瘞之郑村别墅”<sup>②</sup>，为护存这些藏品，真可谓煞费苦心。令人惋惜的是，潼关破后这些故物还是所剩无几了，家人清赏的景象也一去不返，唯有在文字中去追忆了。

在博雅好古的家风影响下，元好问早已养成鉴藏古物的爱好。他对书画艺术最是兴趣盎然，不仅工于书法，且精于字画赏鉴，尽力延续着鉴藏字画的家族传统。其《换得云台帖喜而赋诗》尾联“今日云台见遗墨，黄金牢锁玉麒麟”<sup>③</sup>，表达的即是通过交换获得韦诞真迹后欲加倍呵护的心情。经他鉴赏题写的字画非常丰富，既有王维、范宽、巨然、文同、郭熙等唐宋名家之作，也有王庭筠、杨邦基、马云卿、杜莘老等金代书画家的作品，体现了其书画造诣与鉴藏界地位。元好问诗文中出现的古旧器物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其《铜雀台瓦砚》诗云：“爱惜铅花洗又看，画栏桂树雨声寒。千年不作鸳鸯去，唤得书生笑老瞶。”<sup>④</sup>《文房四谱》载：“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渗。世传云，昔人制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绤滤过，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与众瓦有异焉。”<sup>⑤</sup>铜雀台瓦砚因古朴厚重的意蕴和特殊的制作工艺而成为世人争相宝藏的对象。此诗充分表达了他对该砚的爱惜之意和摩挲赏鉴时的怀古幽情，彰显了士大夫鉴藏古物的审美心理，也赋予古物更为深厚的文化价值。正大六年（1229），四十岁的元好问始举子，欣喜之余作诗《阿千始生》与词《朝中措》（添丁名字入新收）各一首，词序云：“小儿子生，适有遗羽阳宫瓦者，因以羽阳字之。”<sup>⑥</sup>羽阳宫为秦武公时所建，元祐年间宝鸡县居民浚池时偶得其瓦，“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

①②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393页。

③ 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册，第1752页。

④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4册，第1641页。

⑤ 苏易简著，石祥编著《文房四谱》，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5页。

⑥ 元好问《新乐府》卷二，《元好问全集》卷四三，第3册，第861页。

随势为之，不取方正”<sup>①</sup>。可见羽阳宫瓦比铜雀台瓦更加古老而稀有，元好问在“拾得羽阳宫瓦”后心中大喜，竟至以“阿千”为儿子元抚的乳名，又以“羽阳”字之，足见其对此瓦的赏爱。在强烈的兴趣驱使下，他还经常多方搜求古物，其《觅神霄道士古铜爵》云：“雷章着土纷朱碧，秋菌春蒲人不识。若非仪狄墓中来，应自杜康祠下得。古人我得酒之传，摸索饮器流馋涎。巧偷豪夺吾何敢，他日酬君九府钱。”<sup>②</sup>记录的是其羁管聊城时从神霄观何道士处觅得古铜爵之事。朋友知其有收藏之癖，常以古物相赠，其《汴禅师自斫普照瓦为砚，以诗见饷，为和二首》其一云：“寺废瓦不毁，砚奇功亦多。已知良斫少，更奈苦心何。挺挺刚无敌，津津润可呵。羽阳陵谷变，冰井字书讹。赠比黄金璞，辞惭紫石歌。遥知玉音在，洗耳俟研磨。”<sup>③</sup>当收到好友汴禅师以普照寺瓦制作的砚台后，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更为难得的是，元好问还经眼和鉴藏过多种宫廷内府之物，尤其是出任京官期间曾见过大量名家书画，其《虞美人》（题苏小小图）即是在秘书监观苏小小像后所作，有句云：“美人图子阿谁留？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sup>④</sup>再如其有《醉猫图二首，何尊师画，宣和内府物》，《太白独酌图》题下自注“宣和所藏李伯时笔”<sup>⑤</sup>，足见其眼界之开阔，也颇显露出文化自豪之意。

元家旧有藏品虽在贞祐兵乱后“盖无几矣”，但到撰写《故物谱》的蒙古太宗八年（1236），元好问于二十年间就重新积聚了不逊往日的古物。据其自述“今此数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时之遗也”可知，除一些旧物外，此时的大部分藏品是他渡河后所得。那么“今此数物”具体指何物呢？我们可从其移居冠氏县后所作《学东坡移居八首》略窥一斑，其二末句称：“我贫不全贫，尚有百本书。”“百本”自是概数，足见其于颠沛流离之中仍极力购存了数量可观的古籍。他曾在《校笠泽丛书后记》中提到自己购求和整理古籍的一段经历：“右丛书，予家旧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纸番复写，元光间应辞科时，买于相国寺贩肆中。宋人曾校定，涂抹稠叠，殆不可读。此本得于闾内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赋》《拾遗诗》《天随子传》，而无《颜尧后引》，其间脱遗有至数十字者。二本相订正，乃为完书。向在内乡，信之、仲经尝约予合二本为一。因循至今，盖八年而后卒业，然所费日力，才一旦暮耳。”<sup>⑥</sup>除文集外，元好问家中所藏更有多种实用医书，其《元氏集验方序》云：“予家旧所藏多医书，往往出于先世手泽。丧乱以来，宝惜固护，与身存亡，故卷帙独存。壬寅冬，闲居州里，因录予所亲验者为一编，目之曰《集验方》。”<sup>⑦</sup>积极收藏古籍，且精心整理编订，真正实现了古籍的文献价值，而在丧乱中不惜金钱与生命护存这些古籍的努力，体现出的正是其文化救亡之良苦用心。

元好问《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三为我们更为详尽地列举了当时所藏故物：

故书堆满床，故物贮满箱。浑浑商宝鬲，累累汉铜章。杖饰昭敬恭，严卯诃瘳刚。雷文绕杖节，兽面出佩璜。私印刻王尊，玉斗蛟龙翔。逸少留半纸，鱼网非硬黄。亦有县首帖，不辨作雁行。雪景睿思物，宣政旧所藏。晋公古渔父，浩歌濯沧浪。因观官骑图，卧驼识提囊。溪石舍余润，奚墨凝幽香。南荣挂风响，云裾佩铿锵。镜背先秦书，八字环中央。读之三叹息，此日何时光。（《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745页）

该诗以故书满床、故物满箱开篇，以见物叹息、怀古伤今作结，中间则一一描述眼中故物，脉络清晰，感慨深沉。他最先介绍的是一个古朴的商代宝鬲和一串汉代铜制官印。接着是汉代玉杖上常见的铜鸠，

① 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澠水燕谈录》（与欧阳修撰，李伟国点校《归田录》合刊）卷八《事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3页。

②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703页。

③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1册，第421页。

④ 《新乐府》卷三，《元好问全集》卷四四，第3册，第876页。

⑤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六，第4册，第1743页。

⑥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327—328页。

⑦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中册，第665页。

王应麟《玉海》引《礼仪志》：“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sup>①</sup>可知汉代有赐七十岁以上老人鸠杖的习俗，以此昭示朝廷对老者的敬恭之意。“严卯”则是汉代贵族阶层为了驱疫辟邪所佩带的双印，以白玉、黑犀、象牙等不同材质区别佩带之人的身份等级，其上刻有六十六字：“正月刚卯既决……庶疫刚瘳，莫我敢当。”<sup>②</sup>此即诗中“河瘳刚”之所本。然后是饰有精美雷纹的旄节、刻有兽面图案的玉佩、西汉名臣王尊的印章、盘绕蛟龙的玉制酒器等，真可谓琳琅满目。随后元好问又炫耀了一番收藏的古人字画，书帖有王羲之的真迹，因为纸张“非硬黄”<sup>③</sup>，还有一幅南朝著名书法家王昙首的作品；三幅图画亦非常珍稀，据笔者推断，分别是：被宋徽宗和金章宗内府收藏过的《雪景图》，唐代画家韩滉的《渔父图》，以及宋徽宗临摹张萱的《宫骑图》<sup>④</sup>。此诗最后还提到了尚留余润的端溪砚石，透着松烟幽香的奚墨，发出美妙声响的南檐风铃，以及背面书有篆书铭文的汉代铜镜等。结尾二句“读之三叹息，此日何时光”值得玩味，引起叹息的正是上句提及的镜面“八字”，即汉代铜镜上常见的“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一类的篆书铭文<sup>⑤</sup>，从中可感受到他对“此日”的感伤以及对光明盛世的憧憬。明人茅元仪读到此诗时不禁感慨：“偶读元遗山《移居》诗曰：‘我贫不全贫，尚有百本书。’‘故书堆满床……八字环中央。’所有亦可谓富矣，尚称贫士耶？”<sup>⑥</sup>当然，元好问在诗中只是略举其最值得称道的宝物而已，其蓄藏或远不止此。

有了丰富的收藏经验后，元好问经常受邀鉴赏和题咏友人收藏的宝物，所涉范围非常广泛。有出土之古剑，其《蛟龙引》前四句云：“古剑咸阳墓中得，抉开青云见白日。蛟龙地底气如虹，土花千年不敢蚀。”<sup>⑦</sup>有珍贵的洮砚，其《赋泽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砚》曰：“旧闻鸚鵡曾化石，不数鸚鵡能莹刀。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砚来临洮。玄云肤寸天下遍，璧水直上文星高。辞翰今谁江夏笔，三钱无用试鸡毛。”<sup>⑧</sup>更有多方名贵古镜，为此写下《马云汉方镜背有飞鱼》《良佐镜铭》等作品。至于他为友人题咏的古人书画更是不胜枚举。由于博览多识且工于诗文，元好问在鉴藏圈子里很快积累起声誉地位，对收藏界之掌故与藏品之价值也愈加熟悉。如其《云岩》诗序叙述奇石之来历：

观州倅武伯英，崞县人。……尝得宣和湖石一，窳窍穿漏，殆若神剗鬼凿。炷香其下，则烟气四起，散布盘水上，浓澹霏拂，有烟江叠嶂之韵。吾乡衣冠家，法书名画及藏书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独特宝石以擅奇汾晋间耳。兴定末，伯英歿于关中，杨户部叔玉购石得之。壬辰围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诗。危急存亡之际，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来东平，过圣与张君之新轩，而此石在焉。圣与名之曰“云岩”。予问石所从来，圣与言夏津王帅得之汴梁泥涂中，而以见贻。（《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3册，第1218页）

元好问对云岩宝石之材质、工艺、流传等情况及其审美妙境和收藏价值的描述，可谓如数家珍。这段文字既反映出金代士人雅好收藏的风气，亦可见在赏鉴过程中生成的诗文进一步提升了收藏之物的审美价值。从此诗“一堆寒碧殊不凡，满谷春云更堪喜”“摩挲不作几上看，缟白纤青便千里”<sup>⑨</sup>等句，能体会

① 王应麟《玉海》卷九〇《器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45册，第431页。

②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二〇《輿服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册，第3673页。

③ 赵希鹄《洞天清录·古翰墨真迹辨》：“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赵希鹄等著，尹意点校《洞天清录（外二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

④ 参见拙文《元好问的绘事游艺实践与诗画同宗观念》，《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

⑤ 参见李学勤《日光镜铭新释》，《文博》2013年第1期。

⑥ 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二〇，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间李文田家钞本，第7b—8a叶。

⑦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三，第2册，第588页。

⑧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4册，第1598页。

⑨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3册，第1219页。

到元好问赏鉴时的慕恋之意与想象之远。他为王玉汝宣和宝石“云峽”所赋诗句亦是如此：“石盆清冷贮秋水，水面苍烟飞不起。一堆寒碧几砚间，宝气峥嵘插箕尾。”<sup>①</sup> 观一静物而能联想出如此清新高远的天地奇观，与其说是宝石本身蕴含的艺术美感，不如说是文学化的鉴赏方式为宝石赋予了诗性品格。

明人瞿佑指出：“元遗山在金末，亲见国家残破，诗多感怆。”<sup>②</sup> 元好问对故物的文学书写亦有此特点。他常因乱世中物之迁转流落思及个人遭遇，从而流露出伤时之叹。如《云岩》序文交代完宝石经壬辰之乱沦落于汴梁泥涂的遭遇后不无感伤地说：“予因叹一物之微，经历世变，迁徙南北，乃复为好事者之所宝玩，似不偶然。乃为诗道其故。”<sup>③</sup> 兵乱之中，沧海横流，一物流徙尚且如此，人何以堪！元好问又有一诗，题为《益都宣抚田侯器之燕子图诗传本，己亥秋七月予得于冯翊宋文通家。会侯之子仲新自燕中来，随以归之。仲新谓予言：“兵间故物，一失无所复望，乃今从吾子得之，焕若神明，顿还旧观，似非偶然者。方谒时贤，以嗣前作，幸吾子发其端。”因赋三诗。丙午春三月河东元某谨题》，其二有句云：“古锦诗囊半陆沉，吴枫句好入江深。”其三：“才气田侯绝世奇，山丘零落更堪悲。”<sup>④</sup> 兵乱之间故物失而复得，何其有幸，然田侯已逝，《燕子图》诗本成了这段雅事及诸名公相与咏赞盛况的最好见证。面对这些故旧之物，难免会兴起身世感慨和伤时之意，其《毛氏家训后跋语》中言：“壬辰之乱，侯王家世之旧，忠贤名士之裔，不颠仆于草野，则流离于道路者多矣！”<sup>⑤</sup> 《惠崇芦雁三首》其三：“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万里身。”<sup>⑥</sup> 于是，故物搜求与题咏成为元好问等金末士人天涯流落之伤情的别样寄托。

元好问金亡前后的故物题咏中也常会忆及故人与金源昔日之盛，流露出浓厚的黍离之悲与文化感伤情绪。蒙古太宗十年（1238），他为东平王玉汝“云峽”宝石赋诗云：“故都乔木今如此，梦想熙春百花里。膏血纲船枯九州，亡国愁颜为谁洗。主人天质粹以温，天然与山作知闻。退食从容北窗卧，今古起灭真浮云。”<sup>⑦</sup> 颇有借宋徽宗事抒发金亡之痛的意思，而对王玉汝闲适生活的称赞道出了自己欲退居家乡的心愿。这种感伤之情多通过其书画题咏传递出来，如《题刘才卿湖石扇头》：“扇头唤起西园梦，好似熙春阁下看。”<sup>⑧</sup> 《郑先觉幽禽照水扇头》：“风流一枕西园梦，惆怅幽禽是故人。”<sup>⑨</sup> 《题李庭训所藏雅集图二首》其一：“衣冠忽见明昌笔，更觉升平是梦中。”<sup>⑩</sup> 眼前故物易引发其对承平盛日的美好记忆，借此似可短暂逃离现实的感伤。尤其是金室王孙完颜璘的字画更能勾起他的故国之思，如《祖唐臣所藏樗轩画册二首》其二：“题诗忆得樗轩老，更觉升平是梦中。”<sup>⑪</sup> 最具代表性的是其作于天兴三年（1234）的《密公宝章小集》：

天东长白大宝幢，天河发源导三江。有木蔽映山朝阳，云谁巢者雏凤凰。云间吐气日五色，百鸟不敢言文章。名都盘盘魏大梁，黄金甲第罗康庄。王家书绝画亦绝，欲与中秘论低昂。密公书院无丝簧，窗明几洁凝幽香。元光以后门钥废，文士稍得连壶觞。客来喜色浮清扬，典衣置酒

①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834页。

② 瞿佑《归田诗话》卷中“叙金末事”条，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册，第1267页。

③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3册，第1218页。

④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3册，第1252—1254页。

⑤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中册，第1100页。

⑥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4册，第1707页。

⑦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云峽》，第2册，第834页。

⑧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976页。

⑨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4册，第1709页。

⑩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977页。

⑪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967页。



余空箱。生平俊气不易降，眼中俗物都茫茫。渊明素琴嵇阮酒，妙意所寄谁能量。在昔武元握乾纲，扶桑为弓射八荒，猎取大国如驱羊。民风朴鲁资鸷强，文洽未及武克刚。兴陵之孙越王子，天以人瑞归明昌。十三执经侍帝旁，十八健笔凌阿房。撑肠文字五千卷，灵台架构森铺张。高阳苗裔袭众芳，胡不置之贡玉堂。袖中正有活国手，地下才得修文郎。悲风萧萧吹白杨，丘山零落可怜伤。承平故态耿犹在，拂拭宝墨生辉光。恰似如庵连榻坐，一瓿春露澹相忘。（《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第2册，第672—673页）

该诗是为寓居聊城的友人李天翼而作。开篇追溯了金之发源到定都汴京初期的繁华，随后盛赞了密国公家堪比宫廷内府的收藏之富，并赞美完颜璫之雅韵气度，表达了对其不用于世的惋惜之情。摩挲墨迹如见其人，进而恍如见到承平旧日的王家气象，现实却是故人魂归地下，故国山河破碎，怎能不令人感伤。既伤其人、伤其物、伤其世，也伤于一代文化之零落。诗中还委婉批评了金人轻文重武的风气，表现出文化感伤之余的深沉之思。出身皇族的完颜璫境遇尚且如此，其他文士之不得志可想而知。刘祁在反思金亡原因时转述其父之言曰：“如屏山之才，国家能奖养挈提使议论天下事，其智识盖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暂欲有为、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纵酒，无功名心，是可为国家惜也。”（《归潜志》卷一二，第139页）与其说是为李纯甫之不幸而叹，毋宁说是为国家不能重用才士而叹，此正同于元好问题咏密公故物时的感伤之意。

兵乱中的收藏之物尚会几经易主，甚至有陷入泥淖之中的悲惨遭遇，足见物之命运系于时运，难以恒久占有。那么元好问等人广泛搜求古物，且在危急之际“连箱累篋，宝惜固护，与身存亡”<sup>①</sup>的原因何在呢？难道只是文人笔下常见的“遗簪败履，惻然兴怀”吗？

### 三 儒学影响下元好问的古物鉴藏观念与金人的文脉赅续意识

好尚古物的现象发展到宋金时期已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士大夫鉴藏古物的心理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徒为玩好之欲者，有贪多炫博者，有附庸风雅者，有攫取名利者，也有考古求知者，可谓不一而足。元好问则不唯好收藏、精赏鉴，其古物鉴藏观念也别具一格，超出了鉴藏活动本身而表现出以古物增智修德乃至绍继斯文的高远心境，彰显着受儒学影响较深的金代士人群体重视稽古礼文的文脉意识。

不同于役于物而忽其大志的一般收藏家，也有别于无欲无情而空诸万有的道释人物，元好问秉持圣人“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的待物之道，认为唯有如此方可承续斯文与有补世教。他在《故物谱》中说：

或曰：“物之阅人多矣！世之人玩于物，而反为物所玩。贪多务取，巧偷豪夺，遗簪败履，惻然兴怀者皆是也。李文饶志平泉草木，有‘后世毁一树一石，非吾子孙’之语，欧阳公至以庸愚处之。至于法书、名画，若桓玄之爱玩、王涯之固护，非不为数百年计，然不旋踵，已为大有力者负之而趋。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后之恤哉？”予以为不然。三代鼎钟，其初出于圣人之制，今其款识故在。不曰“永用享”，则曰“子子孙孙永宝用”，岂为圣人者超然远览，而不能忘情于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盖自庄周、列御寇之说盛，世之诞者遂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虽圣哲之能事，有不满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虽然，彼固有方内外之辩矣。道不同不相为谋。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饥而忘食，以游于方之外，虽渺万物而空之，犹有托焉尔。如曰不然，则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惟得之有道，传之无愧，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遣累，矫情以趋达，以取异于世耶？（《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393—394页）

<sup>①</sup>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如庵诗文序》，下册，第1486页。

对于沉溺物欲的世俗之举，元好问借他人之口进行了批评，明显受到宋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sup>①</sup>观念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他认同“或曰”之看似达观的态度。桓玄、王涯、李德裕等名士或好奇贪心于法书名画，或疲敝精神于一草一木，在欧阳修等人看来自是“近乎愚矣”<sup>②</sup>，然而元好问以为庄周、列御寇等泊然无欲、放浪形骸的做法，不唯不近人情，也有违圣人之道。他举三代钟鼎铭文为例，认为古之圣人制作“永用享”等铭文并非溺于物欲玩好，而是因为其中承载着祖宗的道德心迹，象征着统叙的传延。以古为鉴，他明确反对玩物丧志和故作达观的异端之学，推崇“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的态度，这是其重视古物鉴藏的主要原因。他在《小紫玉池砚铭》中语重心长地说：“苍龙、太一，玉版之次。维宝砚三，并此而四。出中秘，归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赐。子孙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sup>③</sup>能将世所罕见的内府之物收入囊中，令人欣喜，但此时的他不仅没有矫作达者之态，还淳淳告诫子孙要永世保之，只因记录一代史实的《壬辰杂编》等正由此出。宫廷之物落于己手本非所宜，然子孙如能继承其致用传史之志意，也算是“得之有道，传之无愧”了。与宋代文士以古物补史与清赏自愉相较，元好问的古物收藏之心更为深沉远大，其中加入了接续文脉的自觉意识，颇有志乎圣人之意。

元好问的鉴藏观念明显受到儒家器物思想的影响。备物致用本是器物的最初价值，所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sup>④</sup>。如此则后人对古之器物的收藏守护，便具有了承传礼制文化和学习圣人智识的重要意义。儒家向来有重视名与器的传统，名器相符才能政教大行，这是元好问提倡“守器”的思想渊源。《左传·成公二年》载：“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sup>⑤</sup>孔子之所以对孙桓子不满，是由于他将“曲县”和“繁缨”轻易送给了别人，此二者一为诸侯所配享之乐，一为诸侯所用之马的腹带装饰，仲叔于奚用之是为僭越，于礼不合。所以宁可多予其土地，也不能赠之以名器，原因在于：“唯车服之器与爵号之名不可以借人也，此名号车服是君之所主也。名位不愆则为下民所信，此名所以出信也；动不失信然后车服可保，此信所以守车服之器也。礼明尊卑之别，车服以表尊卑，车服之器其中所以藏礼，言礼藏于车服之中也。”<sup>⑥</sup>古人正是以特定器物来承载礼制名号，钟鼎、玺印等更是国家和君权的象征，因此历朝都非常重视持守国之重器，《后汉书》载：“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李贤注曰：“龟鼎，国之守器，以喻帝位也。”<sup>⑦</sup>宋人夏竦也认为“官必正名，职惟守器。稽考古道，职官惟称”<sup>⑧</sup>。所以说，元好问的古物收藏观念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只不过他将古人礼器的范畴扩展到青铜器物、古籍字画等一切文化古物而已，这是守器观念由帝王下移至士大夫文人所带来的必然变化。

鉴藏古物以增长知识并成为通古通今之君子，是元好问“守器以为智”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处的“智”不仅指外在的见闻之知，也包括内在的德性之知。在这点上，元好问略近于宋人的格物旨趣与崇古心态。王国维在阐述宋代金石学繁荣原因时指出：“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

① 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一《宝绘堂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356页。

②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一四三《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记》，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7册，第536页。

③ 《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七，下册，第1531页。

④ 王弼等注，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七《系辞上》，《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上册，第82页。

⑤⑥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五，《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93—1894页。

⑦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9册，第2511—2512页。

⑧ 夏竦《议职官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四五，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9册，第38页。

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sup>①</sup>宋代文人收藏古物确实带有增广见闻的旨趣，欧阳修自述《集古录》价值为“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sup>②</sup>，刘敞认为古器物有助于“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溢”<sup>③</sup>，皆是宋代鉴藏活动学术化的直接体现。宋人对古器物的格致还常伴有究其义理的目的，李公麟言：“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旨，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朝夕鉴观，罔有逸德，此唐虞画衣冠以为记，而能使民不犯于有司，岂徒眩美资玩，为悦目之具哉！”<sup>④</sup>金代的金石书画成就不及宋人，但也涌现了蔡珪、元好问等著名收藏家。宋儒之学问精神与义理趣味也深刻影响了元好问等人的观物方式，形成了探求知识和修养德性的双重价值追求。元好问《良佐镜铭》即以小观大，围绕古镜这一生活微物阐发了其中蕴含的闳衍大义：

鄜城张氏蓄古镜以百数，其一识云：“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虽作细小物，而闳衍博大之义寓焉。丙戌夏四月，予过汜南，良佐请铭其镜，因取往所见八言之义，衍之以为铭。良佐忠于爱君，笃于事长，严于治军旅，又谦谦折节下士，从诸公授《论语》《春秋》，读新安朱氏小学，以为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峙之金，金城之工。刻画之制，锻炼之功。自其细者而观之，不过为栉纵、巾帨、几杖、盘盂间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则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旷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诸身而取诸物，此偏暗之所以掩其聪。须眉之不烛，妍媸之不别，与亡镜同；善恶之不明，白黑之不分，与亡视同。岂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挟昭旷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盘盂之中？古有之：“见尔前，虑尔后。”吾愿君子之扩而充。（《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上册，第108—109页）“鄜城张氏”即收藏古镜尤多的张穀。元好问从古镜八字铭文写起是想说明，其言近而旨远，古人制作微物亦持敬谨态度，从而引出其后的义理阐发。“良佐”指金末名将完颜彝，曾师从王渥研习理学，所以元好问以镜为喻，并引周武王镜铭“见尔前，必虑尔后”之语，勉励其应从镜之烛照万物、鉴别妍媸中，悟得明心见性、存善去恶之理，以扩充君子之学。因物明理的旨趣在其古物书写中比比皆是，又如他为马云汉所藏背有飞鱼的方镜赋诗，后两联云：“开朗休嫌露圭角，圆通宁复滞方隅。衣冠正了浑闲在，一片灵台欲付渠。”<sup>⑤</sup>也是借镜子之形状与功能阐发修身处世之道，主张既正仪形，也正心体。可见，与欧阳修等以古物证史的意图相比，元好问更喜欢挖掘古物中蕴藏的深厚义理以图修身之效，多了几分醇儒的意思。

具备了博古通今的广大学问与道德声望，则易于取得功名富贵，古人常称这种考索古事的本领为“稽古之力”<sup>⑥</sup>。元好问曾以桓荣的故事赞美友人的诗礼传家，其《寿张复从道》云：“先生弦歌教胄子，子亦诗礼沾余芳。……桓荣家世传一经，何患不蒙稽古力。”<sup>⑦</sup>只不过在他看来，能在乱世苟活已是稽古为智的绝大好处了，他在《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其一中说：“并州一别三千里，沧海横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几家儿女得安全。”<sup>⑧</sup>此诗作于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携家返乡时，离贞祐南渡已有二十多年，在此期间战火频繁，多少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屠戮。他庆幸能够保全儿女顺利返乡，

①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下册，第363页。

② 《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一三五《集古录目序》，第7册，第298页。

③ 刘敞《公是集》卷三六《先秦古器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第715页。

④ 翟耆年《籀史》卷上“李伯时考古图五卷”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⑤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马云汉方镜背有飞鱼》，第4册，第1623页。

⑥ 《后汉书·桓荣传》：“即拜佚为太子太傅，而以荣为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第5册，第1251页）

⑦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3册，第1321页。

⑧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3册，第983页。

并将其归功于自己对古人之事的推察和对圣贤之道的领悟，古物鉴藏显然包含在稽古之力的范围之内。

守器稽古于个人而言可以修德增智，于国家而言则有着继承古人礼制仪文以治平天下的政治意义，此即历朝都极为重视的稽古礼文之事。洪迈称赞汉武帝昌明文治之功曰：“《诗》《书》《易》《礼》之学，彬彬并兴，使唐、虞、三代以来稽古礼文之事，得以不废。今之所以识圣人至道之要者，实本于此。”<sup>①</sup> 是否注重稽古礼文，成为后世衡量一代治绩的重要标准。即使是金、元等北方民族政权，在接受儒家文化之后也逐渐崇尚稽古礼文之事。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礼部尚书张晞等进献《大金集礼》，该书代表着金源礼乐文化的最高成就，金代典章制度多赖以以定。其中多处提及了稽古礼文的重要性，如《大定三年增上睿宗尊谥》：“百王相因，事贵稽古。”<sup>②</sup> 又《大定十一年册礼》：“宪唐虞之稽古，监殷夏以从周。”<sup>③</sup> 提倡考察古人典章之事，揭明圣人治世之道，反映出金人对中原礼乐的尊崇态度。《金史》称张晞“最明古今礼学，家法为士族仪表”，并赞曰：“古者官有世掌，学有专门，金诸儒臣，唯张氏父子庶几无愧于古乎。”<sup>④</sup> 赵秉文《张左丞碑》也说：“大定、明昌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上方留意稽古礼文之事，于是御史大夫清献张公，厘正国朝仪礼，成一代大典，润色太平，皇矣唐矣！”<sup>⑤</sup> 积极推行中原礼乐、遵循古制的背后其实含有金人昭示正统的意识。

金人在灭辽和北宋时接管了大量图书资料和古迹文物，并且“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行抢救、保护”，表现出“对传统文物、儒家文化的向往和热爱”<sup>⑥</sup>。金代士大夫的稽古礼文之事也主要包含典籍和文物两个层面。首先是对古代典籍的收藏和阅读，毕竟图书才是赓续文脉的主要载体。现存史料中关于金代士人热爱古籍的记载比比皆是，体现出蔚为一代的藏书风尚。元好问家中所藏古书甚多，前文已论。其他文人笔下也常提及搜罗和阅读古书的热情，宇文虚中《和题稽古轩》云：“堆架缣缃粲郛居，眼前长物扫无余。避器肯要邻人卜，论友先寻上世书。汲古不须忧绠短，随波聊复任舟虚。勿欺丈室才容膝，六合神游有日车。”<sup>⑦</sup> 以“稽古”名轩，彰显出主人高雅好古的品格。古书满屋，足不出户而能神游六合，这对其后郝经、吴澄等人的“内游”说有着直接影响。郝经《内游》云：“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岂区区于足迹之余、观览之末者所能也。”<sup>⑧</sup> 为昌明文运，培养儒学人才，一些有识之士搜集和整理儒家典籍以教育学子。孔天监《藏书记》云：“虽家置书楼，人蓄文库，尚虑夫草莱贫乏之士，有志而无书，或未免借观手录之勤，不足于采览，无以尽发后生之才分。吾友承庆先辈，奋为倡首，以赎书是任。邑中之豪从而和之，欢喜施舍，各出金钱。于是得为经之书有若干，史之书有若干，诸子之书有若干，以至类书字学，凡系于文运者，粲然毕修。”<sup>⑨</sup> 这可视为民间层面的稽古礼文，“以中原文化为内涵的书籍成为女真人融入华夏文明的重要途径”<sup>⑩</sup>。

稽古礼文不单是文献层面的整理、研究，实包含“备物”“守器”的物质层面，尤其是那些“制

① 洪迈《容斋五笔》卷四“汉武帝田蚡公孙弘”条，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下册，第877页。

② 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卷四《追加谥号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5页。

③ 《大金集礼》卷二《帝号下》，第32页。

④ 脱脱等《金史》卷一〇六《张行简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册，第2329、2334页。

⑤ 赵秉文著，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一二，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8页。

⑥ 孟古托力《试论金朝儒家文化分期——兼议“崇儒重道”基本国策》，《满语研究》2001年第2期。

⑦ 《中州集校注》甲集第一，第1册，第30页。

⑧ 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二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上册，第530页。

⑨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上册，第1934页。

⑩ 薛瑞兆《论金代社会的藏书风尚》，《求是学刊》2006年第6期。

度法象之所寓，圣人之精义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变者”<sup>①</sup>的古物，实与礼乐文献一样弥足珍贵，因此鉴藏古物是稽古礼文的又一重要途径。比如一些金石器物，不仅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补充，更因其坚硬不坏的质地而别具一种传之不朽的象征意义和据之以仿制的示范功能。宋代常以内府所藏的青铜器物为参照仿制礼乐之器，金廷收藏这些古器亦有此考虑，均体现出以正统自居的文化意识。金廷常选派那些博学宏儒推行稽古礼文之事，除典章制度外又很注重对古代器物的征集考究。《中州集》蔡珪小传载：“正隆三年，铜禁行，官得三代以来鼎钟彝器无虑千数。礼部官以正甫博物且识古文奇字，辟为编类官。丁父忧，起复翰林修撰，同知制诰，改户部员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礼文之事，取其议论为多。……有《续欧阳文忠公集录金石遗文》六十卷，《古器类编》三十卷，《补南北史志书》六十卷，《水经补亡》四十篇，《晋阳志》十二卷，《金石遗文跋尾》一十卷，《燕王墓辨》一卷，传于世。”朝廷对征集到的钟鼎彝器进行编类整理，蔡珪因“辨博为天下第一”而被征辟，从其所著书目便可见其对古物鉴定之精通。如此丰富的古物著述颇值得注意，体现出蔡珪在文史领域和器物文明层面全方位接续北宋以来文化正统的意识，其影响至为深远。元好问列举这些著述后指出：“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sup>②</sup>从萧贡到元好问以至天下之人一致认同蔡珪为“国朝文派”的开创者，与其丰富的古物著述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这一重要概念就是由“这段文字而引发出来的”<sup>③</sup>。这些著作不仅代表着金代文章学开始褪去“宋儒”的身份色彩而自具品格，更承载了为金朝礼制文化建设提供稽考参照的政治功能，有效推动了北方文脉的崛起。所以说，金代士大夫的古物鉴藏多含有“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的理念，近可以扩充德智以守家，远可以稽古礼文以兴国，用之小大不同，其为文脉传承则一。

综上所述，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士大夫普遍有鉴藏古物并进行文学书写的雅好。他们收藏的丰富古物与相关著述不仅是斯文斯道的重要载体，也是金源一代之美的集中投射，彰显着华夏文明在更广阔的北方大地绵延生长的文化格局。金代士大夫的古物鉴藏虽受到宋人崇古风气的影响，但也表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和意义。他们于金源全盛之日鉴藏古物，颇有追慕唐宋文士风雅与认同中原文化的心理，是其致力于稽古礼文和涵养中州元气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提升金源文化的层位；金元易代之际，元好问等人搜集鉴藏古物的行为和文学书写则显露出文化感伤的浓重色彩和护佑文脉的使命意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女儿三潭忆避兵，遗簪败履不胜情。金源文献空山在，野史亭前夜哭声。”<sup>④</sup>歌颂了元好问在兵乱中保存金源文献的功绩。可以说，元好问等人积极搜求、鉴藏和书写古物，与整理中州文献和撰写一代之史有着相同目的，都是为了延续华夏文明。如果没有元好问等人在易代之际担负起包括古物鉴藏在内的文化救亡进而是重建文脉的重任，元代很难构筑起混一南北的文化共同体。“挽崦嵫之日，啖欲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气，著衣冠一代之典刑”<sup>⑤</sup>，遗山先生无愧也！

[作者简介] 杨万里，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论文《刘因的“游艺”之学与文艺思想——兼论理学“流而为文”现象的书画视域》等。

(责任编辑 马 旭)

① 吕大临《考古图后记》，吕大临等撰，陈俊民辑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91页。

② 《中州集校注》甲集第一，第1册，第170—171页。

③ 胡传志《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④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与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附校补]合刊）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⑤ 《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二一《祭遗山先生文》，下册，第566页。